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 与科学的 政治经济学体系

王向成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 与科学的 政治经济学体系

王向成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济南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王向成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3.00 32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9—02101—9

A·67 定价:16.00 元

序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探索当中的主旋律。现实是最为真实的历史,而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对于经济理论的认识和思索必须从当前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现实出发才有可能形成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改革开放,18年来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与实践,把社会生产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正视现实、尊重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待历史发展和进步的一贯态度。当然,也只有正视现实、尊重事实才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的。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综观这一切,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背离,还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回归,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必须做出肯定答复的问题。只有生活在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书是王向成同志近三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的成果。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仅把马克思的一般经济规律作为专门问题加以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与马克思的价值生产理论和社会关系理论联系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加以认识。其实,单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当作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分支理论来加以探索这一问题本身就特别有意义。过去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生产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等同起来,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后者是在对前者进行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譬如,我们过去只注意到了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出来的经济形式,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运用一般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活动的有计划性所依据的经济学原理缺乏充分足够的认识。而一旦充分认识到了经济活动的一般范畴,对经济形式的反思和批判就会更为彻底、更为深刻,对经济形式的变迁就会有更为自主、更为彻底的认识和理解。当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发展的各个规律分为各个专题加以阐释,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价值生产规律所具有的内在必然性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学说的理解也将更加丰富,这既是当代社会给我们提出的课题,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山东财政学院院长 卢希悦

1997年5月

目 录

序	(1)
引 言 一个世纪性课题	(1)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科学或非科学的形态	(8)
第二章 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26)
第三章 意识形态形式与意识形态原理	(48)
第四章 个人范畴与个人历史	(66)
第五章 交往、交往形式与生产力	(88)
第六章 政治革命调节经济关系	(109)
第七章 所有关系与所有制形式	(130)
第八章 两种私有制	(150)
第九章 剥削与经济伦理	(168)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方法	(189)
第十一章 资本“原罪”	(216)
第十二章 三种价值	(234)
第十三章 交换关系与供求规律	(255)
第十四章 剩余价值的源泉(一、流通部分)	(281)
第十五章 剩余价值的源泉(二、生产部分)	(304)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的源泉(三、劳动条件)	(328)
第十七章	收入源泉、劳动形式与阶级	(348)
第十八章	社会形态的构成、演进与东方社会	(367)
第十九章	哲学理论.....	(391)
后 记		(408)

引 言：一个世纪性课题

邓小平同志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 这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是“我们过去对”“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同志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②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89年邓小平同志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③ 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是“多年来”都“存在”的。邓小平同志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次提问，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史和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学说体系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能沉默、必须回答的一个世纪性课题。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上所迸发出来的历史性的最为光辉灿烂的思想火花。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不存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理解和解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的实践之间始终没能形成符合一般人类思维习惯的联系形式。而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现状，追根溯源提出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137页。

③ 同上书，第291页。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问题,是多么地谦虚、诚实,又是多么地勇敢、无畏。它表现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综观历史的当代中国改革家的远大眼光,同时又表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三次提问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解是首先在学科归类的基础上开始的。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概述”^①中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②而关于“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③这就是说,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在对“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列宁说:“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④这里“三个最先进的国家”是“德国”、“英国”和“法国”,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体系也就由于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关系而平行并列地相应分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个不同的学科里面。按照列宁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这种学科归类,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⑤、“辩证法”^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8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①以及“阶级斗争”；^②而列宁又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③这里，列宁并没有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某一部分，还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④和“剩余价值”^⑤这两部分。而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正是构成政治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学说，然而列宁却在这里把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学中就存在的价值观点，以及无论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商学派，还是法国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一直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都存在的这种价值学说，从政治经济学里单列出来，而称之为“经济学说”，这样，至少从形式上，“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似乎就不存在了。从而，列宁说：“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⑥这样，哲学上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上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了“马克思的观点”的“总”的“构成”，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此就被分为相当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学说部分的“经济学说”，以及其余被归到哲学或社会学中去的部分，这样就再也看不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马克思的各个政治经济学结论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而不是“运用”了。前联邦德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哈贝马斯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6页。

⑥ 同上书，第5页。

“1938年斯大林编纂、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所采取的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后果,以致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理论框架内。”^① 其实,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斯大林编纂、整理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②的“理论框架内”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研究也是一直被限定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的归类和划分这种对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肢解了的框架之内的。1995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汉语版四卷本的第一卷^③删去了排列在197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汉语版四卷本第一卷卷内首篇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④,这必然意味着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的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到来。与此同时,在该版本卷首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所写的《编者的话》里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分类^⑤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形式。并且在该版本第一卷卷内开篇的《说明》中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称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同时,^⑥又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⑦。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①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2页。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① 从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即“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而产生的。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上的“原理”在“社会”、“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现象”、“社会历史”“研究”当中的“应用”而形成的,因而,这个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与人类生存条件之间的必然关系为主题去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就在列宁之后又一次地归结到了哲学而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面,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或者“经济学说”再次与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失去了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记载的文字材料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必须以有文献材料作证的马克思或恩格斯曾经说过的言论为依据。由于能够代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的大量重要著作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前苏联首次以俄文版问世的,因而对马克思学说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手里。在这种形势下,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著作及其所表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开展了研究,如本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松涉就以重新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全部发表的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著称^{②③}。当然,在马克思身后与在马克思在世时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解释往往只是有关马克思理论的某一个结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4 页。

② 吉田杰俊:《现代思想论》,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17 页,注释 9。

论,而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和学术观点按照它的思维主题的学科归属而放在一个学科里面、当作一个理论体系或学说体系去进行前后一贯的理解和认识。恩格斯说:

“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显然,马克思生前所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针对“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恩格斯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

面对“搞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所”“搞”出来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不得不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恩格斯也不得不不止一次地重申了马克思所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的汉语版第一卷第1版的出版时间是1956年12月^③,而这个版本的第50卷即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是1985年12月^④,距今也只有10余年的时间。看看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看看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所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而且与马克思针对东方社会和中国所提出的专门理论相联系的可能性,可以毋庸置疑地说重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即按照政治经济学自欧洲起源以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论题的传统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版权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版权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或学问的本来面目,以及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理解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已经成熟了。应当用马克思的常用概念和常用词汇来阐释马克思的学说,应当做到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当中完全应当坚信马克思在提出他的学说体系的过程中是有深刻思考的,而且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也一定是符合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所固有的思维方式的。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科学 或非科学的形态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或学问的产生、组成和发展,具有成为一种科学的趋势。它之所以能够从其它学问或学科当中分化出来首先在于它具有自己特定的认识对象;其次在于它的认识对象不是纯粹理念性的、必须通过想象才能认识的东西,而是在这门学科的认识范围以内通过经验性的观察和感受就可以认识;最后,经验材料的积累提出了理论形式的要求。

如同某种学问或学科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科学的形态出现一样,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科学也不是在各种学问、知识一出现的时候就产生了的。同样,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或学问不例外地也是在自己的形成当中发展自己能够作为科学的知识形态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科学的形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科学的概念所要定义的内容。而对科学下定义就意味着凡是据称是科学的某门知识或学问必须具备这种在人类各种已有的知识类型中最为完善的知识形态的基本特性。虽然这些特性并不是全部的、充分的作为科学的知识形态特征,但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知识类型的定性条件。因为这是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在自己的形成历史当中所决定了的东西。作为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具有明确的认识对象。认识对象范围不清、游移不定的学问不能成为科学的知识。其次科学知识的认定方法,不管是作为一般的通用方法,还是作为这门知识对象的特有方法,都必须是明确的和在整个认识活动中前后一贯固定不变的。最后,科学结论的形式必须与科学对象的形式相一致。有关经验性对象的科学结论必须以经验性的形式出现。并且,科学结论与科学对象之间的关系不能是或然

的,即不允许结论与对象之间出现无关或矛盾的状况。总之,科学作为特定知识形态的一种,在它的内部及相关各部分间不允许存在自相矛盾。

政治经济学如同其它各门学科一样,力图成为一门科学。因为,科学是近、现代人类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是人类所能取得的现实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象征。在十九世纪,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卡尔·马克思为把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而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试图了解马克思的观点的人过多地关注他的结论,而他的出发点往往却被这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所忽略和忘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是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学说和观点亦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起始点,因而也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秘诀的入口处。忽略了这个问题将会使任何企图认识和弄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失掉能够最终获得合理解答的可能。不论是解释或者批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人都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或者说对或者说错。即使是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的阿基尔·洛里亚^①也只是在讨论马克思的交换理论的时候提出马克思“庄严地犯下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②,这种试图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批评马克思的人并没有认真地去考察马克思的科学观,或者至少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马克思学说的初衷去认识,从而更深入地问如果他的学说是“诡辩”的话,然而又为什么是“自觉的”。马克思说: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
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1009页。

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①

马克思是在“1842-1843 年间”“第一次”接触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在此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哲学和历史”以及“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的“法律”。而: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②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有关这些“经济问题”的“辩论”“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通过对“哲学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认为: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

“市民社会”是“历史”“学科”范围的对象,而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从而: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④

这样,马克思就从“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到产生了“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开始”真正转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

“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 1847 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⑤

马克思对他的“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论点”的“第一次”“科学的”“表述”是在“1847 年”。这说明马克思对他们的“论点”一开始就是以“科学的”“表述”而表达出来的。马克思说: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1 页。

② 同上书,第 82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84 页。